



□ 邱 然

(一)

口述历史是融合历史学、文学、新闻学、档案学的一门综合学科，主要是运用笔录、录音、录像等方式记述和保存亲历者和见证者对历史事件的回忆口述，以此发掘、记录和研究历史。口述历史有别于传统的物传、言传、文传，是记录和研究历史的新形式，使史学研究的视野已从单纯文献史料，转向社会资料的发掘。口述历史的重要应用之一就是抢救历史资料，为近现代史研究提供资料。《习仲勋与群众路线》采访实录，就是口述历史的成功运用。

习仲勋同志出生于1913年10月。他13岁参加革命，18岁组织发动“两当兵变”，19岁与刘志丹等同志创建照金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21岁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娃娃主席”。后来在错误肃反中被王明路线执行者关押，党中央和毛主席到达陕北后才得以释放平反。抗战期间，他先后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和北大门。抗战胜利后，他任西北局书记，时年32岁。解放战争期间，协同彭德怀指挥了保卫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和陕甘宁边区的战役。他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时才45岁。1962年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受到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1978年复出到广东，团结省委“一班人”推动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

习仲勋同志的一生曲折、精彩、传奇，富于故事性。讲述他的经历，当然可以由官方修传，可以辑录文献或纪念文稿。但采用口述历史的方式，无疑会增加历史的具体性、丰富性，真正传达出“群众口中的习仲勋”。事实上，习仲勋同志在陕西、北京、河南、广东、江西等地都留下了足迹，他接触了大量干部群众，人们与他共事、交往，甚至在一面之缘中的所见、所闻，对他的认知、评价，都长期散落民间，如果不是依靠口述

历史的方式，他们所提供的历史片段不一定都能载入史册，而随着人员流动、衰老、离世，这些史料将会逐渐消失。用口述历史的方式收集这些史料，整理后加以出版，是非常迫切也是较为科学的方式。

《习仲勋与群众路线》上下册的采访历时5年，采访人数多达200人，行程超过30000公里。采访对象都曾经与习老有过交集，现在多为老人，很多年远的采访对象已经不能自己写作了，还有一些群众并未受过专业的写作训练，如果让他们写，即使写出来，也难以保证质量。而谈话则相对比较简单，我们专门选用新闻学专业的、健谈的同志负责采访工作，根据选题立意预先设计好采访提纲，围绕采访提纲与采访对象交流、谈天。在轻松的环境下，采访对象回忆起往事比较真实全面。与此同时，我们配备相应的作家、编辑，作家负责记录、整理访谈内容，编辑则搜集相关的采访资料，为文稿的编辑和出版做充分准备。正是由于深入实地访谈，团队化创作模式，经过前期精准策划和选题论证，挖掘和抢救了大量的珍贵史料，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再现了习仲勋同志的光辉一生。

(二)

好的口述史，要有好的呈现。在《习仲勋与群众路线》采访实录创作中，我们采用了从选题策划到写作、编辑出版都由一个团队完成的“编创一体化”模式。采访组在人员配备上做到优势互补、专业互补，达到功能和效率的最优化，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编创一体化”模式，首先有赖于团队敏锐的策划力。《习仲勋与群众路

线》采访实录的策划，缘起于党的十八大之后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本来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但一个时期以来，随着党的执政环境和社会条件发生变化，一些领导干部中出现了不会走群众路线、不会做群众工作的现象。配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我们想到了被毛泽东同志赞誉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的习仲勋同志，认为他的经历和丰功伟绩完全可以作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的生动教材。如何把习仲勋同志的经历和事迹写活，我们想了很多方法——如果请知名作者来写，恐怕会陷入一家之言；如果请党史专家来讲，又恐怕偏重理论和宏观。我们决定要写一本与众不同的书，要写出习仲勋同志本人丰满的形象、鲜明的风格。我们发现，之前出版习仲勋同志的图书都是由编写组编写的，这是因为他从来不爱给自己树碑立传，他一生最大的特点是走群众路线，他爱群众，群众也爱他。或许，让群众来讲述他们和习仲勋同志的故事，才是最好的解读方式。由此，我们确立了《习仲勋与群众路线》的定位——让群众来讲习仲勋同志践行群众路线的故事。对这个定位的阐述，就是“这不是文献资料中的习仲勋，也不是影视作品中的习仲勋，而是实地访谈所得第一手材料，这是最真实的群众口中的习仲勋”。

“编创一体化”模式，关键在好的执行。而好的执行，基础是好的团队。我们采访组配备了三个方面的人才：专业采访者、专业作者、专业编辑。

专业的采访者。《习仲勋与群众路线》一书的采访过程，就是与口述者进行交流和搜集信息的一个过程，

采访者把口述者的观点融入采访主题，为采访引入强有力的支撑和支持。采访之前，采访者会根据主题制定整个项目的方向，根据口述者的职务、履历和之前的言论或作品量身打造采访提纲，并根据提纲每一条内容做相应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包括：阅读相应的著作，收集和查阅相关的新闻报道和统计数据，并勾勒出整篇行文的大致框架，并依次在采访中作出相应引导。在提纲拟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对方的立场和思维方式，对一名普通劳动者和一名知识分子的采访，应当是不同的，因为他们的特点不同、经历不同、语言表达方式也不同。在设计问题时，做到由近及远、环环相扣，由浅入深、不断深入，而不是盲目的随意提问。采访者问题的设计尽可能照顾文章写作的需求，并且以对材料的熟悉和通过充分的做功课，来考虑采访对象可能给出的答案，以确保整个采访过程、方向、框架、内容大致都能在采访者掌控之中。

专业的作者。作者与采访者合作多年，具有默契的沟通协作能力，作者本人具备相应的国史、党史研究和写作经验，以及对口述者所提供资料的把握和取舍能力。在口述者所讲述的内容基础之上，有文学加工的能力，这种加工要基于口述者本身的语言特点、身份、职业、性格特点来进行文学化的语言提炼和加工，力求使文章更具有口述史的趣味性和易传播性。当然，这种加工不能脱离口述者的原意。作者也掌握丰富的资料，在口述者所述内容与历史资料不相符的问题上进行甄别、推断与考证。必要情况下，需要向口述者本人求证或多方求证，以应对口述史

创作中经常出现的史实材料冲突问题。

专业的编辑。编辑具有多年的图书编辑、审稿、出版经验，主要把握所有字、词、语法的正确使用，搜集、整理和保存采访资料，对采访时时间、地点、姓名、履历等信息进行收集和查证。编辑在团队中的工作最为繁琐，采访前期参与采访提纲的准备，采访过程中搜集整理资料，采访之后对资料进行保存和归纳整理。在文稿形成后，还要进行文字编辑加工，口述历史类的稿件既要语句通畅，符合语法要求，又要保持口语原汁原味的特点，在有些地区的采访中夹杂方言，甚至还要对相应的方言语法、词语进行必要的、准确的、简洁的注释。最重要的是，口述历史类的稿件当中往往夹杂了口述人的主观感情和个人态度，甚至有的不符合客观历史，编辑必须精通党史，在审稿时对此类内容进行审核把关和优化调整，并对错误和前后矛盾之处进行修正，确保文稿达到出版水平。

团队协作精神是“编创一体化”团队创作模式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人的智慧也是有限的，所知所学是有限的，人对事的理解必然有主观性和片面性。所以一个人很难做到从多角度、立体地去了解采访对象及其所述的历史。一个团队有不同经历、不同专业的成员相互协作，可以弥补各种缺点和不足。

(三)

传统国史与党史著作，比较偏重于档案、文献及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活动，而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经济

以微观方法深化中共党史研究

□ 张海荣

微观史研究有利于增强党史学宏观叙事的“科学性”

还原历史、使研究尽可能客观与真实，是史学研究者所秉持的基本原则，也是党史学人的终极关怀。研究成果唯有真切、真实，才会体现科学性。科学性既是党史学的生命力，也是发挥其“资政育人”功能的有力保证。

从理论上讲，宏观研究应以微观研究为支撑，微观研究需以宏观研究来统领，如此，方能科学地研究党史打下牢固基础。目前来看，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研究者大多习惯于宏大叙事和概括总结，宏观史研究在党史学界一直拥有相对的主导地位。辩证地看，宏观史研究对构建党史学“元知识”有着基础与参照意义，同时也起到了资政育人作用。然而若过于偏重宏观的概括和论证，对党的历史微观层面的研究重视不足，就容易形成一定程度的固化思维倾向，甚至影响到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与科学化进程。

为避免这种情况，要重视对党的历史研究中的微观视角，通过对党史宏观叙事中的一件事、一个村、一个镇、一个县等诸如此类的个案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梳理，把微观层面作为史学研究的着眼点。这样的研究，并不等同于取代或解构了“宏观叙事”，相反，还能为宏观研究提供生动的注脚。细言之，即借

助显微镜式的微观探头，将枝蔓缠绕的复杂情境呈现出来，使历史变得“有血有肉”，贴近真实。这种有血肉、显肌理的历史，更能引发研究者的深度思考。这样，政治逻辑、历史逻辑与生活逻辑等解读历史的不同之“角度”，得以“琴瑟共鸣”，相互衬托，以此建构起来的“宏观叙事”才“靠谱”，其科学性得到进一步增强。

立足于微观的中共党史更能丰富和支撑宏观研究

长久以来，中共党史学所研究的对象和角度相对比较宏观。对此，胡绳有过评论。针对一些主流研究部门写党史“多半都是会议史，写法基本上是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的状况，他提出：应该多写人民群众，总是写政治、写政策，最后没有写到具体的人，没有落到人民群众的感受和社会具体的变化身上，所谓的政治就成了悬在空中的东西。这股历史就会消解其凝聚人与涵养人的应有成效。

历史是人的历史。不管男女老少、地位高低，都存在主体性表达，因之所演绎出的历史纷繁复杂。就政党而言，领导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具体到政策制定与执行方面，往往双向互动，尽显历史的“复杂性”与“合力性”。例如，1956年至1983年的中国农业集体化时期，在农地经营问题上，当党和国家倡导集体生产、集体经营的时候，有些

地方的农民，坚决表示愿意“分田单干”；而1982年前后，当政策提倡搞“大包干”时，有些农民却坚决反对“分田单干”。比如“大包干”之后，北京窦店与韩村河、河北省周家庄等地集体经营模式的存在，给现今中国农村发展道路提供了深度思考与多元参照。

总之，微观视角的研究透视出的丰富性，恰恰可以用来充实、衬托及支撑宏观历史研究。如上所述，把农民作为研究中国农业合作化进程中的视角，能够使史学的研究和分析论证更为充分客观。此种研究方法能够使中国农业合作化的背景和科学性得到更好诠释，进一步避免了历史虚无主义，增加了人们的历史认同感，党史也不再“单调空洞”。这种“上与下”结合展现主体能动性的历史，主干与枝蔓兼具，充满张力，客观真实。

微观史研究同样能深度诠释党史学的“整体性”

关于史学研究的整体性思维，对其深入理解和诠释，不能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思考上，需要借助研究实践进行细致揣摩和辨识。整体性研究思维不仅不排斥微观历史，反而因丰富鲜活微观史的聚焦与引申，使自身变得更有层次感、纵深性。离开了具体研究实践，没有研究过程中的深切体悟，主观地认定微观史研究是“碎化”、宏观史研究为“整体”，以这种思维方式主导研究方向和视角，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党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以下探讨，或许有助于理解此类问题。在一次关于中共党史学研究方法的论坛上，关于微观个案研究，当主讲人围绕“一个乡村业余剧团变迁（1942—1992）”讲述时，有位研究生提问：间隔很久的这段历史如何进行材料收集？微观个案研究能否有整体观照？

关于材料收集，所给予的回应是：通过田野调查，尽可能获取相关村台账、当事人或知情人口述资料；查阅所在县域历史以来的文教档案，了解县委、县政府有关乡村业余剧团方面的指示和报告（包括永久卷和长期卷）；到地

区乃至省一级档案馆查阅省委、省政府特别是相关文化部门对乡村业余剧团的各级指令与执行反馈（以计划、报告等形式出现）。其中，中央层面的相关政策指令已在列，需要留意。而为使研究有比较视野起见，应查阅职业剧团变迁中的相关档案，对其他地域乡村业余剧团同样选取典型性个案进行调查。与此同时，还要关注不同时期乡村戏剧的研究动态，特别要深入思考伴随着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变迁，乡村“唱大戏”功能是什么、发生了什么嬗变；等等。据此，后一个问题显然也有了答案。

上述围绕主题的层层剥笋与延展，体现出历史研究的“贯通性”或曰“博通性”。准确地讲，于史学而言，整体性思维应该是“贯通意识”。因为“治史不宜归纳，只能贯通”。即便要谈“整体性”，更为可取的是“贯通”基础上的归纳和概括。

治史的贯通或曰博通，借用严耕望先生的思考，可从两方面来谈：“第一，史学本身的博通。即对于上下古今都要有相当的了解，尤其对于自己研究的时代的前后时代区域，要有很深入的认识，而前面的时代背景可能更为重要。若治专史，例如政治史、政制史、经济史、社会史、学术史等等，治某一专史，同时对于其他的专史也要有很好的了解，至少要有相当的了解。第二，史学以外的博通，也可说是旁通，主要的是指各种社会科学”。

诚然，历史研究的整体性（或曰贯通性）能否被较好诠释，不仅取决于宏观研究，还要注重微观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能够使党史研究更加深化、更加科学完整。此外，还在于研究者的学养。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深浅高下，根本取决于研究主体学养的“薄”与“厚”。学养越深厚，研究会越有问题意识、复杂性考量，具备“包容性”。由此，研究成果体现出的是用证据（史料）说话，和风细雨，不偏执、不空泛。也就是说，研究者的学养越深厚，宏观和微观视角研究的视野越开阔，结合越紧密。

讲好党校的课，要求党校教师有理论素养，授课内容有学术框架。而备课、写讲稿的过程，就是教师对授课主题进行研究的過程。因此，写好讲稿是党校教师必备的一项基本功。

建构理论框架，需要深入研究。写讲稿，相较于课堂讲授而言是一种“静态”的过程，需要静下心来“坐冷板凳”，把所要讲述主题的理论框架梳理清楚，把相关理论的学术渊源深挖出来，反复研究，扎扎实实地落实到文字上，这样在课堂上，就不怕讲课思路不清晰，不怕理论讲解不准确。

党校课堂既要讲“理论”，也要讲“实际”，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问题意识”“问题导向”是党校课堂的一大特点，要带着问题讲，帮助学员解决理论上、思想上、认识上或工作上的问题和疑惑。而要解决“问题”，就需要对“问题”这个“实际”进行归纳、提炼、分析及提供解决方案。写讲稿的过程，就是围绕“问题”进行“探究”和“解答”的过程，也是对讲课内容“由浅入深”层层深化的过程。

而从学员角度而言，讲课在“深入”之后，还需要“浅出”，要让学员听得懂听得进去。写好讲稿也可以说是做到“深入浅出”的一种“良方”。好讲稿需要不断回看和修改，当回看稿子时，教师要将自己转换到学员的角度来考量讲授内容，在对讲稿进行修改时，要着重突出“浅出”这一因素，这也是打磨好讲稿的有效方式。

讲稿写好了，教师基本上就有了讲好课的底气。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东京说：“教师要讲好课，写讲稿绝不可敷衍，只要讲稿真写得好，哪怕你在台上念，我想学员也不会给低分”。关于这一点我深有感触，我所在的工作单位是基层党校，自有师资相对有限，但是我校狠抓教师“讲课稿”，要求教师每个专题课写2万字左右的讲稿，并且要经多重打磨才算成型，学员对经过这样精细打磨的课基本都给予了肯定和好评。

总而言之，教师写好讲稿对自己讲课有帮助，对提升教学质量有帮助，对学校进行课程开发也有帮助。写讲稿，不仅仅是教师一个人的事，学校也有必要组织专家进行指导和“审阅”，帮助教师打磨讲稿。对学校而言，试讲和评审讲稿，要作为同等重要的事情来对待。

□ 付克义

写好讲稿是一项基本功



党史研究工作者对村干部和村民进行口述史访谈